

遺民幻夢：戰後初期張達修遺民想像的幻滅與重構*

李知灝

虎尾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張達修（1906-1983），號篁川，南投竹山人。少時負笈台南新化深造漢學，昭和7年（1932）到8年（1933）曾短暫至日本神戶擔任詩人莊櫻癡之記室。返台後又於昭和16年（1941）遠赴中國上海從事文化事業，直到戰後回台。在台灣經歷二二八事件、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等歷史事件。張達修將這段時期見聞入詩，成為見證戰後初期時代劇變的一手資料。而張達修承襲自乙未割台以來，透過父祖、師友及「地方」場域中流佈的傳說，進而形成以漢文化為根基的遺民意識。這種「遺民（後遺民）」意識，在戰後找到情感上的出口，將追尋文化「祖國」的欲求寄託在戰勝國之一的中華民國政權。就如同替「遺民」的幽魂找到一個可附身的政治實體，試圖以此擺脫「遺民」的身分。

但在張達修的作品中也可見，日治時期以降的遺民意識在戰後動盪的變局中快速變化。面對接踵而來的二二八事變、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等時代變局，遺民的幽魂再次抽離，呈現出隱逸避世的心情。從不斷企求、依附到離魂、夢醒，就發生在短短的戰後數年間。而台灣的遺民意識在戰後也與渡海來台的詩人產生對話，在張達修詩作中開始出現不同於日治時期的「遺民」書寫

* 本論文為科技部計畫「遺民意識與地景書寫的交織：以張達修《醉草園詩集》為研究中心」（計畫編號 NSC 102-2410-H-150-013-）之部份成果。

面向。從原本以漢文化祖國為對象的籠統想像，逐漸聚焦到恢復一個完整國度的反攻政策，更進一步被帶入冷戰架構「自由／共產」的對抗情境，形成戰後初期古典詩書寫的特殊之處。

關鍵詞：遺民意識、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台灣古典詩、台灣文學、身分認同



The Dream of Loyalists:

Disillusionment and Reconstruction for the Loyalist Imagination of Zhang Da-xiou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Li Chi-Hao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Abstract

Zhang Da-xiou (1906–1983), also known as Huang-chuan, was from Jhushan, Nantou County, Taiwan. He left for Sin-Hua, Tainan City, Taiwan, to study sinology. From 1932 to 1933, he went to Kobe, Japan, and served as secretary for, a poet, Zhuang Ying-chi. After returning to Taiwan, he went to Shanghai, China in 1941, and was engaged in 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did not return to Taiwan until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 Taiwan, he witnessed the 228 incident and the retrea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government to Taiwan, therefore presented the experience he had gone through in his poems. He had learned the legends regarding Taiwan since the cession of Taiwan to Japan in 1895 from his father, grandfather, teachers, friends, and other local people and that also generated his strong loyalist consciousness to Han culture.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his desire of pursuing culture of “motherland” had found its way out by resting it on the ROC regime, one of the winning countries of the war, as if the soul of loyalists had found a political entity to rest on in attempt to get rid of the identity of loyalists. As shown in his poems, his loyalist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had rapidly changed after the war. For witnessing the 228 incident and the ROC gov-

* This study is part of the project “An intersection of Loyalist Condition and Landscape Writing: A study of Zhang Da-xiou’s Tsui-tsao-yuan Poems” f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no.: NSC 102-2410-H-150-013).

ernment retreating to Taiwan, the soul of loyalists was detached from the ROC regime and showing secluded mood. From the constant seeking, attachment, detachment, and disillusionment, the changes occurred in just a few years after the war. At that time, for raising awareness the loyalists formed a dialogue with the poets from the Mainland China, and Da-xiou's writing style also showed a new direction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switch of loyalist consciousness from the general imagination of Han culture to focus on counterattack policies on restoring a full country, and further to be brought against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structure—"freedom and communism" had characterized the classical poetry writing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Keywords: Loyalist Consciousness, Zhang Da-xiou, Tsui-tso-yuan Poems, Taiwan
Classical Poetry, Taiwan Literature, Identity



遺民幻夢：戰後初期張達修遺民想像的幻滅與重構

一、前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而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然而時代的巨變方興未艾，影響著後來數十年的歷史軌跡。戰後在盟軍的指派下由中國民國政府負責接收台灣，而日本則放棄對台灣的統治權。這樣的政權轉變，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其內心又有何感受？或許可從親歷現場的張達修詩作中看出一絲端倪。

張達修（1906-1983），號篁川，南投竹山人。祖、父皆為漢醫宿儒，其祖父張士衡更是南投彬彬社的創社元老之一。張達修少時負笈台南新化，入王則修門下深造漢學。昭和7年（1932）到8年（1933）曾短暫至日本神戶擔任詩人莊櫻癡之記室。返台後又於昭和16年（1941）遠赴中國上海從事文化事業，直到民國35年（1946）回台。在台灣經歷了民國36年（1947）的二二八事件與民國38年（1949）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民國39年（1950）長子張振騰被指控參加讀書會而遭關押綠島，全家遭受白色恐怖的創傷。而張達修將這段時期所見所聞寫入詩中，也成為現今所能看到關於戰後初期時代巨變的一手資料。而在當時的詩人中，張達修作品量豐富且具有相當造詣，¹故為戰後古典詩人中屢屢被研究的對象。然而在現行研究中對於張達修面臨跨時代變局的心境或有討論，²但對當中「遺民」意識惜多

1 張達修在生前曾於1949、1968、1981年三度出版、增訂詩集《醉草園詩集》，而在2007年由其子女張振騰、張翠梧邀請張達修弟子林文龍重新整理其作品，編輯成《張達修先生全集》。而當中《醉草園詩集》、《醉草園詩集續編》與《醉草園詩文補集》，即為本文之主要研究底本。而為求文獻之完備，本文另參酌當時詩文雜誌所錄之張達修詩作。扣除重複詩作，計有4,274首作品，足見其創作量之豐富。而如此豐富的創作量，適足以深入探索期面臨戰後初期的時代變局，內心的幽微變化。而本文在詮釋上亦參考相關論著，以求更全面理解作者之用意。

2 目前針對張達修的研究部分，在學位論文方面有：張滿花，〈張達修及其詩研究——以《醉草園詩集》為例〉（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潘驥，〈張達修文學的三種面向——現代性、異域經驗與創傷書寫〉（嘉義：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張淵盛，〈走向國民：跨政權台灣末代傳統文人的應世之路——以張達修為主的考察〉（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此外，在研討會論文，在張達修家屬張翠梧的贊助下，2005年6月25

未能深入探討。事實上，張達修在詩作中屢次以「遺民」自居，或是以此描述日本統治下台灣民眾的心境。如其〈秋望〉詩有「珠厓遺老難忘漢，破楚詞臣枉賦騷」³、〈新高暮春書事〉中亦有「衣冠幾見遺民淚，歌哭無端野史亭」⁴等語，足見在其心中實有以「遺民」作為自己身分認同的情況。

「遺民」原指「江山易代之際，以忠於先朝而恥仕新朝者」⁵，在漢文化中將這類行為祖述周代的伯夷叔齊，而在宋元以後更是在士人道德品鑑範疇之中。在元代的宋遺民、明代的元遺民、清代的明遺民，在王權遞嬗間不斷擴大了遺民的歷史面貌。甚至從王權轉型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也產生了效忠清廷而鄙棄民國的清遺民。這明顯擴大了漢文化對「遺民」的定義，不再以一家一姓的王權轉換作為遺民意識的基礎，而是以一種政治、文化上的失落作為遺民意識的發端。

在台灣，早在乙未割台之後就產生一脈有別於過去漢文化的遺民意識。如王松自署「滄海遺民」，即顯現台灣被割讓後士人以「遺民」自居的心態，雖然在當時清王朝尚未覆亡。正如王德威在《後遺民寫作》中所指出的「只要丘（逢甲）等仍自許為清室子民，他們因割台而顯現的亡國之思，似乎就是一種僭越：他們已將故鄉等同於故國。」⁶這顯現早在乙未割台後，台灣士人就已衍生出迥異於漢文化傳統的遺民意識，而王德威進一步論述這種具有台灣特色的遺民意識說：

晚清之際，有關種族主義的辯論甚囂塵上。清室以滿族入主中原，經兩百多年的統治之後，其宗族合法性再度因為政權的式微而被挑起。……在台灣歷史脈絡裡，這樣的觀念更另有淵源。鄭成功所代表的海外遺

日由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張達修暨其同時代漢詩人學術研討會」中有江寶釵〈生事歸清恬——論張達修詩中的身／生命觀〉、林文龍〈張達修先生的漢詩師承〉、林翠鳳〈張達修的醉草園描寫〉，後發表於國立台中技術學院《人文社會學報》4期(2005.12)，頁65-85、張淵盛〈張達修《醉草園詩集》中的大陸經驗研究〉等文章。還有筆者在2014年10月23日海洋大學主辦「2014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海峽兩岸東亞沿海地區與島嶼文化學術研討會」中也發表〈殖民母國／文化母國：張達修日治時期遊日、中書寫的遺民心境〉。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中，亦有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彭瑞金教授主持「台灣古典文學家張達修手稿數位典藏計畫」（來源：<http://140.128.27.43/showtest/index.php>）將其手稿進行數位典藏，足見其重要性。

3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續編》（台中：張振騰，2008.12），頁149。此詩亦見於《詩報》27期（1932.01.01），頁24。

4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續編》，頁168。此詩亦見於《詩報》39期（1932.07.15），頁13。

5 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中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09），頁6。

6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11），頁41。

民志業雖然早已不在，卻從來是台灣民間意識的重要資源。乙未割台後的遺民話語，因此未必是針對清室或民主國而發，而可能是越過時空的距離，遙遙與明遺民，或廣義的漢族遺民，的心意相對。⁷

在王德威的觀察中發現，台灣民眾在抒發自身的遺民認同時，並不一定以清廷作為其效忠的舊朝，或有忽視清廷而上溯至明鄭，甚至是以一個籠統的漢族遺民自居。這即是日治時期台灣在「政治文化」上與當時代中國的不同之處，尤顯台灣遺民意識的特殊性。在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中，引用Kavanagh Dennis對「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界定，指出「它意指某一民族／民眾／群體，在特定時期所普遍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政治取向。這些取向的性質，自然涉及了傳統、歷史記憶、動機、規範、感情，還有由此展現出來的象徵符號。」⁸由明鄭王朝開啟的台灣漢人的遺民史，成為乙未割台後台灣民眾普遍接受、重新喚醒來解釋自身遺民心境的歷史記憶。在日治時期的台灣遺民詩人的書寫中，由於對日本殖民政權的抵抗心態，將自己的身世遭遇，與同是漢人的明鄭遺老相接，形成台灣特殊的遺民脈絡。

張達修的生平跨越日治與戰後時期，在日治時期張達修是如何接受自身的遺民身分？面對從日治到戰後的時代變局，在其意識中的遺民認同又有何變化？這些變化又牽涉到那些傳統、歷史記憶或規範、感情？本文將透過其古典詩作，論述張達修在時代轉變下的遺民心境。

二、「遺民」身分的繼承與想像

張達修雖然沒有經歷乙未割台，但其成長、求學過程皆在日治時期，其父祖與周遭師友皆經歷乙未割台的時代變局，或有曾考取功名、自認為是遺民身分者。而張達修自身是否以「遺民」自居？他的「遺民」認同又從何而來？而進一步值得追索的是，這種以「遺民」自居的身分認同，在面臨日本戰敗投降時又有何反應？在詩作中又有何呈現？這即是本節所欲探討者。

7 同註6，頁42-43。

8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台北：聯經出版社，2009.03），頁19。

（一）「後遺民」的身分認同

張達修雖沒有經歷乙未割台，卻常以「遺民」自居，在其詩作中也常透露自己的「遺民」認同，除前面所述的〈秋望〉詩有「珠厓遺老難忘漢，破楚詞臣枉賦騷」、〈新高暮春書事〉「衣冠幾見遺民淚，歌哭無端野史亭」等語呈現以「遺民」作為自我身分認同的情況外，其他又如在〈痴石來索近什適大雪未銷寒不成寐歲晚身遙萬感交集乃起挑燈構四律以報之覺文字沉痛非復曩時豪放矣〉四首之四有「性命但求全亂世，頭銜已認署頑民」⁹，在〈耕澤過存述其近狀詩以慰之〉也有「自許髡鉗成國士，不妨名姓署頑民」¹⁰之語。當中的「頑民」一詞，即為「遺民」的別稱。¹¹但何以如此？張達修並未經歷乙未割台，本身也未曾侍奉清朝，並不符合「江山易代之際，以忠於先朝而恥仕新朝者」¹²的傳統「遺民」概念，為何又以「遺民」自居？在王德威《後遺民寫作》中認為這乃是「後遺民」的表徵，其遺民意識乃是來自父、祖的傳述，進而自行串聯出一個想像的故國，而自己則是這個故國的「遺民」。在《後遺民寫作》中論述其概念時說：

後遺民的要義推向極致，可以滋生反向的辯證。如果遺民把前朝或正統的「失去」操作成安身立命的條件，後遺民就更進一步，強「沒有」以為「有」。前朝或正統已毋須作為必然的歷史要素，挑動黍離麥秀之思。就算沒有前朝和正統，後遺民的邏輯也能無中生有，串聯出一個可以追懷或恢復的歷史，不，慾望，對象。¹³

然而，「後遺民」的故國想像真的是「無中生有」嗎？以張達修的例子來說，其「後遺民」的想像並非無中生有。在殖民政權下各地存續的「地方」場

9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台中：張振騰，2007.05），頁128。

10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續編》，頁179。

11 《尚書·多士·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多士〉。」以「頑民」稱殷商遺民不願降伏者。見屈萬里，《尚書釋義》（台北：中國文化學院，1980），頁148。又可見《史記·周本紀》：「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可見「頑民」與「遺民」有其關聯。見（漢）司馬遷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78），頁133。

12 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頁6。

13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頁48-49。

域，¹⁴ 經歷乙未割台的「遺民」將其意志寄託在場域中，透過「地方感」的形塑，使歷史記憶保存其間。而張達修的遺民意識，除來自父祖、師友遺民意識的感染，¹⁵ 還因為台灣的地景中散布許多明鄭相關的「地方」歷史傳說，前代的遺民透過歷史記憶，不斷召喚著詩人的思古幽情。例如張達修在昭和13年（1938）寫下的〈鐵砧山石歌〉中就寫到：

風雲盤互鐵砧峰，試劍聲沉智井中。寂寞草雞三百載，駐師人去霸圖空。
 何來古石青而黝，摩挲偏出農人手。雲根隱現豈偶然，荒山似有精靈守。
 生成不受祖龍鞭，待補東寧缺憾天。滄海栽桑堅不爛，英雄與汝真有緣。
 粼粼六尺橫三尺，苔侵更作斑斕色。墮淚應同峴首看，去思還作貞珉勒。
 琳瑯一片出中州，弔古人來合點頭。負鼎休教牛礪角，開山碑碧共千秋。¹⁶

此詩前有序云：「鐵砧山在台中州大甲街。相傳鄭延平駐師於此，有山農掘地得一奇石，鄉人為徵詠刻碑立於鄭王祠。」從歷史紀錄看來，鄭成功應未遠征台灣中部，而是嗣位延平郡王的鄭經有率軍征討台中一帶的記載。¹⁷ 但是在台灣「地方」的傳說裡，都將事蹟歸屬於較為有名的鄭成功身上。詩人想像當年在鐵砧山上，鄭成功曾在此地駐紮，雖然後來王朝無法繼續，但山中的精靈為了留下當時的豐功偉業而守護這塊山石，直待後世的農人發掘。從鄭成功曾駐

14 在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論述中，認為「地方」可形成一個場域，使歷史記憶以「地方感」的狀態存續其中，並在政治上扮演一定的角色。他認為：「地方感的保存或建構，是一種從記憶到希望，從過往到未來的旅途中的積極時刻。而且，地方的重構可以揭露隱藏的記憶，替不同的未來提供前景。……隨著認同轉變，通往未來的政治軌跡重新界定，某些記憶便遭到壓抑，其他記憶則自幽暗處拯救回來……因此，想像的地方、烏托邦思想，以及無數人民的慾望，都在激活政治上扮演了要角。」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03），頁101。

15 關於張達修父祖、師友對張達修遺民意識的感染，亦可參見張淵盛，〈走向國民：跨政權台灣末代傳統文人的應世之路——以張達修為主的考察〉，頁37-43。

16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78。

17 在郁永河《裨海紀遊》中記載：「斗尾龍岸番皆偉岸多力，既盡文身，復盡文面，窮奇極怪，狀同魔鬼。常出外焚掠殺人，土番聞其出，皆號哭遠避。鄭經親統三千眾往勦，既深入，不見一人；時亭午酷暑，將士皆渴，競取所植甘蔗啖之。劉國軒守半線，率數百人後至；見鄭經馬上啖蔗，大呼曰：『誰使主君至此？令後軍速退。』既而曰：『事急矣，退亦莫及，令三軍速刈草為營，亂動者斬。』言未畢，四面火發，文面五六百人奮勇跳戰，互有殺傷；餘皆竄匿深山，竟不能滅，僅燬其巢而歸。」見（清）郁永河，《裨海紀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09），頁56。

紮的鐵砧山挖掘出石頭，刻成記載明鄭王朝事蹟的石碑。這塊石頭的存在，彷彿就是為了彌補東寧王國難以存續的缺憾，為遺民留下當時的歷史事蹟。詩末「肩轟休教牛礪角，開山碑碧共千秋」之語，乃表達欲保護這塊具有歷史意義的石碑，使其連同明鄭時期的史事永存於世。

從〈鐵砧山石歌〉的記載可看出，台灣的「遺民」意念將抽象的明鄭歷史寄託在鐵砧山的地景上。透過曾經發生過歷史事件或是帶有傳說的地景，不斷召喚著「遺民」的歷史記憶，形成一個「歷史—地景—歷史」的循環，並形塑出一個特殊而帶有遺民意識的「地方感」。這種地方感則承襲自前輩世代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最終形成「在特定時期所普遍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政治取向。」¹⁸而在過程中台灣民眾進一步將地景具體化，用來自鐵砧山的巨石刻成石碑，將歷史碑文與地景物件合而為一，讓後世的遺民想像有聚焦的對象。從上述看來，張達修雖是王德威所說的「後遺民」，但這種遺民想像並非真的無中生有、「強『沒有』以為『有』」。以張達修的例子來看，其遺民想像或有透過「地方」、地景，以及依附在地景上的歷史詮釋，進一步形塑而成的身分認同。

這種歷史記憶與地景互涉的情況，在張達修的詩作中更是屢見不鮮。如張達修在昭和6年(1931)曾遊歷位於現今高雄市湖內區的寧靖王墓，當時的〈過竹滬弔寧靖王〉對歷史遺跡賦予自身的「遺民」寄託。其詩云：

指點孤墳夕照中，冬青萬樹颯英風。歌殘絕命哀莖髮，計盡分飛鬱寸衷。

歲月河山非故國，蠻荒俎豆尚村翁。不堪回首寧南外，妃塚年年碧草同。¹⁹

詩中頷聯化用了寧靖王〈絕命詞〉「艱辛避海外，總為幾莖髮」的典故，而這句詩原本即是化用了儒家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想法，用來抵抗異族滿清的薙髮政策。雖然時代的變遷讓台灣一地已非過去的漢人國度，但在這荒僻的墳墓上還有人祭祀不斷。這代表著寧靖王以自身殉國的歷史定位，在當時仍受台灣民眾的認同。

18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19。

19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33。

從憑弔寧靖王墓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張達修藉由書寫地景所呈現的不只是對台灣過去歷史的追索，在當中還賦予了漢文化的道德價值。寧靖王不願意改換異族髮型、不願薙髮、以身殉國的「忠」、「孝」意涵，被賦予漢文化中的倫理價值，而這些倫理價值所指向的抵抗對象則是「異族」所建立的「新朝」。張達修在描述這些明鄭時期的歷史遺跡，並不只是單純的旅遊、憑弔，在作品中寓意著作者自身漢文化的「遺民」意識與族群認同。日治時期像張達修一般，未經歷清廷統治卻展現出「遺民」姿態的文人，接近王德威所說的「後遺民」。但這種身分認同並非憑空出現的，而是台灣一地對於歷史遺跡的文化詮釋中，本身就蘊含著漢文化的倫理價值。當文人針對這些歷史地景進行憑弔、書寫，則又再一次將這些漢文化的倫理價值召喚出來。

張達修在其成長背景中，在「地方」的潛移默化下早已被灌輸了漢文化的遺民意識。這也讓張達修在後來遊歷中國的書寫，也可看出他以漢文化作為自身遺民身分認同的基礎。張達修在日治時期除遊歷台灣各地之外，在昭和16年（1941）還前往中國上海工作。當時在常州所寫下的〈謁常垣聖廟〉一詩，也可見他對漢文化的懷想。其詩云：

巍巍魯殿聳江湄，泗水高風喜未移。劫運已非秦歲月，衣冠猶是漢威儀。
升堂入室嗟何日，嘆鳳傷麟奈此時。吾道不孤文字在，蒼苔閒別讀殘碑。²⁰

在常州的孔廟，張達修讚嘆漢文化仍被保留其中。但在時代的變遷下，張達修體認到做為自身認同的漢文化已成過往，只能透過閱讀孔廟前殘留的碑文來懷想過去。這種心境更凸顯張達修將自己視為是漢文化的遺民，在殖民情境下不斷追索過去漢文化的蹤跡。²¹

20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127。

21 更多日治時期張達修透過地方與地景展現其遺民意識的論述，可參見筆者在2014年10月23日海洋大學主辦「2014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海峽兩岸東亞沿海地區與島嶼文化學術研討會」中發表之〈殖民母國／文化母國：張達修日治時期遊日、中書寫的遺民心境〉一文。

(二) 戰後政治文化中的遺民想像

從前述張達修在日治時期的書寫中可看到，台灣遺民意識在日治時期如同幽魂一般，存在各「地方」的地景與歷史傳說之中，同時也縈繞在詩人心中，持續對抗著一個政治實體：日本殖民政權。然而，這種以漢文化作為身分認同的遺民想像，在日本戰敗後又有何反應？在日本戰敗投降的當下，張達修及其同時期的「後遺民」將之視為解除遺民身分的重要時刻。如當時在上海的張達修就寫下了〈台灣光復喜作〉二首，其一詩云：

版圖重復見台灣，喜訊初聞淚欲潸。劫後共迎新歲月，海濱遙念舊河山。

覆盆已解遺民痛，拓土寧忘志士艱。五十一年爭鬥史，啼痕血跡認斑斑。²²

詩的開端陳述乍聞台灣即將回到中國版圖喜極而泣，張達修更認為日本的戰敗投降，讓台灣人長期以來的「遺民」身分得以結束，也結束51年的日本殖民統治與台灣人的反抗史。這種以漢文化遺民身分歡慶日本戰敗投降的情況，在張達修同時代詩人作品中也可見。如林茂生（1887-1947）在〈八月十五日以後〉詩云：「一聲和議黯雲收，萬里河山返帝州。也識天驕誇善戰，那知麟鳳有良籌。痛心漢土三千日，孤憤楚囚五十秋。從此南冠欣脫卻，殘年儘可付閒鷗。」²³ 陳逢源（1893-1982）在〈台灣光復陳行政長官公洽蒞臨喜賦〉詩亦云：「兵哀終竟挽狂瀾，失地收回淚始乾。法令廢除秦日月，壺觴迎接漢衣冠。古今史上留奇蹟，五十年來得此歡。萬戶千門先易幟，重新建設好銘肝。」²⁴ 在詩作中以「漢土」、「漢衣冠」代指台灣與台灣民眾，而以「返帝州」、「失地收回」來描述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回到過去故國的版圖。張達修

22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133-134。

23 據李筱峰《林茂生·陳炯和他們的時代》中所述，本詩原題〈八月十五日以後〉，發表於1945年10月25日的《前鋒》雜誌「光復紀念號」。後來改以〈喜賦〉為題刊載於1965年12月31日的《台灣風物》15卷5期。參見李筱峰，《林茂生·陳炯和他們的時代》（台北：玉山社，2004.06），頁155。此詩亦見引於廖振富，〈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台灣古典詩析論——以詩人作品集為探討範圍〉，《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07），頁263-264。

24 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3），頁53。此詩亦見引於廖振富，〈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台灣古典詩析論——以詩人作品集為探討範圍〉，《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頁264。

及其同時代的台灣古典詩人之所以有如此想像，或與「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中「傳統、歷史記憶、動機、規範、感情，還有由此展現出來的象徵符號」有關。²⁵對於當時的遺民（或「後遺民」）來說，中國是過去的「祖國」，日本則是佔領台灣的異族。為了抒發在異族統治下的抗爭與慘痛心緒，將自身想像中的漢文化「祖國」與殖民政權放在同一個天秤上比較，進而將「祖國」美化並大加歌頌，才產生這種歷史記憶與當時「光復」時勢結合的書寫面向。過去的遺民傳統與歷史記憶，讓張達修在聽聞台灣「光復」的消息時，在情感上很快的認同這樣的變局。

然而，在上述的詩作中也可看出遺民情感中的思考盲點，那就是將「中國」看成一個連續的政權。在乙未割台之後，「中國」的概念已有相當大的變化。從清廷轉變為民國，其後又有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與國民黨的廣東政府相互對抗，又經歷了國民政府北伐、中原大戰等劇烈動盪，再加上國共內戰與日本侵華，其政治局勢與文化早已不同於割台時的「中國」。但是對於「遺民」的情感來說，這一切變化都不足以阻礙他們追尋一個可以歸宿的「祖國」。日治時期以降的遺民情感就有如幽魂一般，不斷追尋著過去的肉身。就像張達修描述他遊歷台灣、中國時，在地景書寫中不自覺的流露自身漢文化的遺民想像，希望透過一個具體的實景來表現抽象的遺民意識。而如今日本戰敗投降，台灣即將擺脫日本統治，這也讓日治以降如幽魂般的遺民意識看到情感上的新出口，不再只是寄託在各別的地景、緬懷過去的歷史記憶，有一個更大的空間架構可以寄託，一個接續過去「祖國」的政治實體。這可在〈台灣光復喜作〉二首其二的詩中可以看到，其詩云：

合浦珠還不用疑，青春作伴約歸期。卻看鹿耳鯤身地，插遍青天白日旗。

三島君臣方屈膝，九原顏鄭儻開眉。文章有願酬家國，圖報涓埃趁此時。²⁶

以漢文化遺民自居的幽魂，突然「發現」自己找到一個可以寄託的政治實體，一個以青天白日旗為標幟的政權：中華民國政府。而在詩作中「青春作伴約歸

25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19。

26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134。

期」一語，在民國48年（1959）版的《醉草園詩集》中其實作「義師一舉逐東夷」。這也可以看出張達修當時仍存有日治時期以來漢文化遺民的想像，以「漢／夷」的觀念來思考當時「中華民國／大日本帝國」的對抗關係，在詩作中「三島君臣方屈膝，九原顏鄭儻開眉」之語更可印證這點。而漢文化遺民意識的幽魂，在張達修詩作中就與中華民國政府合而為一，認為台灣被賦予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就像「合浦珠還」一樣自然。

由此可見，雖然「中國」的政權已經歷多次轉變，但在台灣的遺民意識中，仍將其視為過去想像中的祖國。在民國35年（1946）張達修自上海返台前，其〈勝利後鄉友來滬置酒南國酒家席上賦似〉一詩，也有「漢威已見宣遐邇，禹鼎寧容問重輕」²⁷之語，同樣表現出張達修及台灣同鄉將中日之間的爭戰，視為是漢族與邊疆異族之間的爭鬥，而以台灣回歸漢文化的祖國來思考「光復」的變局。在其即將從上海回台所做的〈離滬歸台有作〉二首之一中還是顯現這樣的看法，其詩云：

樓船相接促行程，檢點征裝百感生。大地方迴新氣象，中年彌切故鄉情。

一衣帶水婆婆海，三月鶯花壯肅城。贏得山河歸夏甸，英雄重拜鄭延平。²⁸

張達修在日本投降的翌年春天從上海搭船，即將橫渡台灣海峽回到台灣時，在船上想著台灣重新回到中國的掌控，彷彿就像鄭成功當年所企求的，回到一個完整的、由漢人所掌控的文化祖國一般。張達修將自己的心緒與鄭成功相結合，這就出自於「後遺民」對自身身分與歷史記憶的想像連結。此即日治時期以降所形成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讓張達修及其同世代詩人所「普遍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政治取向。」²⁹將「中國」等同於漢文化祖國的代表。

當張達修回到台灣，拜訪過去的師友故舊，從其贈答之作裡也透露出這種想法似為當時師友故舊所接受。贈答之作，雖然出自作者之手、是作者個人意識的展

27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135。

28 同註27。

29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19。

現，但作者仍須考量對方的身分立場與意識型態來進行書寫。如在書寫中明顯偏離對方的意念，即失去贈答的用意。因此贈答之作不只顯現作者的意念，同時也可呈現受贈的對方心中某些意識傾向。張達修在其〈光復後謁王則修夫子喜呈並似虎溪舊侶時夫子八十也〉詩中就寫到：

分明魯殿尚巋然，回首程門隔廿年。南國已非秦歲月，西風仍對漢山川。
衣冠喜脫紅羊劫，詩酒重敦白社緣。珍重東籬花放日，稱觴同祝地行仙。³⁰

張達修在公學校畢業後，曾在大正14年（1925）遠赴台南名士王則修門下修習漢學。王則修（1867-1952）在清領時期曾考取生員，後於台南設帳授徒。³¹王則修雖然未曾在清廷正式任官，但由於生員的身分與經歷乙未割台，就如同王松、洪棄生一般，是前清的「遺民」。而張達修以「魯殿」來比喻王則修像魯國的孔子故居般，推崇他如同保存漢文化的基地，讓他得以在二十年前習得漢文。在頷聯筆鋒一轉，以南國指涉台灣、以焚書坑儒的秦朝來指涉日本，強調台灣已擺脫日本的殖民統治，重新回到漢文化的懷抱。而頸聯更表現出他與王則修及當時的同門詩友，對於能擺脫甲午、乙未以來的遺民身分感到相當欣喜。而張達修在贈呈王則修的詩作中有如此表示，應著眼於他的「遺民」身分與對漢文化的認同。如此也顯現當時台灣詩人由於對漢文化的認同，進而迅速的接受「祖國」中國前來「光復」台灣的想像，這也是日治時期以降的「遺民」意識所形成「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影響。

然而如前所述，日治時期遺民情感的思考盲點，是將「中國」看成一個連續的政權。這讓當時的張達修無視於整個中國在1895年之後的變化，並且樂觀的將遺民身分的結束視為是太平盛世的開端，甚而在拜訪台灣詩友時也不斷強調這點。如他在〈高雄晤徐太瘦同社〉詩中說：「贏得珠厓歸夏甸，未妨歌曲唱清平。」³²彷彿只要回歸到「祖國」的懷抱，就能過著清平的生活。

30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136。

31 王則修相關生平可參見「智慧型全台詩知識庫」王則修（來源：<http://xdcm.nmtl.gov.tw/twp/TWPAPP/ShowAuthorInfo.aspx?AID=1025>，檢索日期：2014.12.01）。

32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137。

綜合前面所述，張達修的「遺民」意識從何而來？實承襲自乙未割台以來，透過父祖、師友及「地方」場域中流佈的傳說，進而傳遞的遺民意識。在詩人的成長過程中，自然受到「地方」的感染，或透過明鄭相關的地景傳說來形塑自己的遺民認同，最終形成「在特定時期所普遍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政治取向」。而這種政治傾向是根源於漢文化的身分認同，表現在書寫中就展現出在異族統治下不斷追尋和文化的遺跡，並召喚當中屬於漢文化的倫理價值。這也讓張達修未經歷乙未割台，卻有著「遺民」意識，成為王德威筆下所謂的「後遺民」。這種以漢文化為根基的「遺民（後遺民）」想像，在戰後找到情感上的出口，追尋文化「祖國」的欲求寄託在戰勝國之一的中華民國政權。正如王德威在《後遺民寫作》中提到的：

乙未以來，台灣文人的遺民立場與表述已經展現相當歧異性，難以再用傳統定義概括。³³

「遺民」的傳統定義指「江山易代之際，以忠於先朝而恥仕新朝者」，³⁴然而乙未割台以後的遺民意識是建構在漢文化的基礎上，而非清王朝，與傳統定義有所不同。這或也讓台灣民眾在戰後初期自然而然接受了中華民國政權，認為自身為到了漢文化的祖國，而無庸像「清遺民」一般，去追究其推翻清王朝的故事。而接受中華民國政權，就如同替「遺民」的幽魂找到一個可附身的政治實體，以擺脫「遺民」的身分，重獲新生。

三、「遺民」想像的裂解與重整

雖然時代更迭，但一個人生命歷程的連續性並不會就此中斷。由於日治以降「遺民」意識的影響，所以當戰後台灣為國民政府所接收，他們認為這是解決自己在過去殖民情境下的尷尬身分的最佳狀況。然而，戰後初期台灣的局勢並未就此太平。1945年日本投降，二年後爆發二二八事件，再二年又有大批難民隨著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這一連串迅速的變化，讓張達修有何感慨？而日治以降的漢文化遺

33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頁47。

34 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頁6。

民意識，面對戰後初期的亂局又有何變化？過去身為「遺民」的種種想像，是否影響了張達修在戰後的書寫？當中是否受到戰後播遷來台的中華民國政權及相關人士的影響？又是透過何種途徑進入張達修的書寫中？這就是本節所欲探討者。

（一）高壓政治下的遺民夢醒

以今視之，二二八事件不只是一場動亂，更是台灣在地「後遺民」與理想中的「祖國」決裂的關鍵點。來自祖、父記憶中的祖國，經「後遺民」的過度美化，也讓理想與現實有高度的落差。因此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祖國」想像泡沫化的危機已然浮現。如張達修在1946年寫的〈京滬平昆記者團來高攷察賦呈〉一詩中，就隱約透露了這樣的訊息。詩中如此寫道：

過江人物萃錚錚，文化溝通賴此行。南國江山歸夏甸，西風旗鼓作秋聲。

帝王幾見無冠冕，賓主原來是弟兄。珍重輶軒勤下採，平心褒貶愜輿情。³⁵

在詩中張達修再次強調台灣回到「祖國」懷抱的情狀，但他更希望記者秉持著「無冕王」的精神，並且發揮同胞兄弟的關愛之情，盡心採訪台灣各地民眾的心聲。更希望透過記者的採訪與撰稿，針砭時政，讓當時台灣民眾的心聲得以傳遞出去。更值得注意的是，若張達修還維持之前「贏得珠厓歸夏甸，未妨歌曲唱清平」的想法，認為只要回到祖國的懷抱就能享受清平的盛世，那又為何希望來自中國的記者團能反應台灣民眾的心聲呢？張達修雖未明言，但在戰後的一年間，或因戰後的社會情勢未若之前想像的美好，而在情感上的變化。

1947年2月28日，由於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種種措施為台人所失望，再加上在天馬茶房前因為查緝私煙所引發的騷動引|爆了二二八事件。若不是普遍性的失落情緒，一場地方的小騷動也不致於演變成全台性的大事件。³⁶

35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137。

36 如葉榮鐘在1961年寫成的〈哀哀美麗島〉一詩，回憶二二八事件之前的情境時說：「八年沐血戰，故土幸重光。滿望歸懷抱，悠悠來日長。何意不旋踵，禹域沒洪浪。未曾得喘息，飽受池魚殃。焚琴復煮鶴，百怪恣橫行。衣冠多魍魎，道路滿豺狼。港風肆披靡，海派復猖狂。芝蘭淪糞土，雞犬坐堂皇。……」充分凸顯出戰後貪官污吏侵害台灣民眾的情況。見葉榮鐘，《少奇吟草》（台中：晨星文

然而震動全台的「二二八事件」在《醉草園詩集》中卻未見張達修在當年有與事件直接相關的詩題。只隱約在〈重遊北投有作〉詩中看出一絲端倪，其詩云：

浮萍飛絮託浮生，暫喜偷閒養性情。百歲人懷千歲慮，出山泉異在山清。
此心但覺無歸宿，大錯翻憐已鑄成。惆悵闌牆猶未息，烽煙又起古長城。³⁷

詩末「烽煙又起古長城」之語，當時共軍與國軍正在東北、華北一帶爭戰的狀況相符。但「大錯翻憐已鑄成」、「惆悵闌牆猶未息」之語，或有可能指涉國共內戰，但也可能指涉年初的二二八事件，詩人嘆息大錯已然鑄成、台人與外省人士的兄弟闌牆尚未平息，遠方卻又傳來國共在長城進行爭戰的消息。這些動亂讓張達修原本理想中遺民回歸祖國美夢開始崩解，讓他心中產生動搖，進而有「此心但覺無歸宿」之嘆。而進一步考察1947年當年度的詩作中，就以〈高雄市長仲圖兄勇退賦呈〉二首與二二八事件最為相關。其詩云：

難弟難兄並，才名媲二蘇。襟懷原磊落，進退不踟躕。南國留棠蔭，
西風倒菊壺。春秋公論在，毀譽任狂夫。
竹馬當年事，蓴鱸故土情。誰知黃叔度，猶似魯諸生。風雨雞鳴急，
園林蝶夢清。倦遊聊小憩，珍重一身輕。³⁸

這二首詩表面上是贈答應酬之作，但詩中卻隱含了事件過程的描述及其影響。黃仲圖（1902-1988），字河軒，南投鹿谷人，正好與張達修為同鄉。中日戰爭時投效國民政府並加入中國國民黨，1945年回台從事接收工作，後被指派為高雄市長。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黃仲圖曾在3月6日前往壽山的要塞司令部會見司令彭孟緝，希望軍隊停火卻遭到逮捕。雖然後來獲得釋放，但在同年6月辭職，後受聘於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³⁹ 從其遭遇可知，黃仲圖的辭職並非

化出版社，2000.12），頁257。詩後有編註：「此詩成稿一九六一年五月廿三日，《少奇吟草》（指舊版）未有。周定山漫評：筆致清順，而寄慨遙深，末段聲色俱厲，慨當以慷。」

37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140。

38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141。

39 詳見「維基百科」黃仲圖（網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4%BB%B2%E5%9C%96>，檢索日期：2014.12.10）。

自願，或有政治上的壓力而不得如此。因此在詩作中，張達修以「春秋公論在，毀譽任狂夫」之語，來安慰黃仲圖公道自在人心。更以「魯諸生」來稱讚黃仲圖不願阿諛上級的耿介，⁴⁰ 光明磊落、進退有據。

但值得思考的是，二二八事件震盪全台，當時在現場的張達修卻未留下任何明顯指涉事件的作品，何以如此？張達修之所以不言，實則驗證了戰後政治上的高壓統治。而張達修之所以留下這二首歌頌黃仲圖「勇退」的詩作，應是暗示他對當時政局的不滿就藏在更隱微、難以被高壓政權偵查之處。例如張達修在同年寫下的〈日月潭〉一詩就如此，其詩云：

雲鬟霧髻望中收，八景端推占上頭。潭水拖青分日月，樓台涵碧自春秋。

湖山歷歷疑圖畫，風雨瀟瀟入釣舟。世界已無乾淨土，攜家準擬此優游。⁴¹

此詩雖未書寫二二八事件，但也充分展現在事件之後，原本滿心期待回歸漢文化「祖國」的張達修，在此時也轉為悲觀、失落。詩中「世界已無乾淨土，攜家準擬此優游」之語，顯現張達修的隱逸、避世之意，而原因卻是對過去想像中的「祖國」之幻滅。從回歸「祖國」的狂喜到失落，使得原本支撐「後遺民」精神的最後一根支柱，在戰後的現實中硬生生的斷裂。這也讓台灣詩人展現出不同面貌的遺民書寫，在「祖國」政權下呈現出隱逸避世的遺民心境。⁴²

如前所述，自日治時期以降的台灣漢文化遺民意識就如同幽魂一般，不斷在尋找一個「祖國」的實體。而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讓這股漢文化遺民意識幽魂很快的接受了中華民國政權做為依附的對象，並將之視為是「祖國」的延續。雖然遺民的幽魂在戰後短暫的找到一個可以依附的政治實體，但面對接踵而來的變局，遺民的幽魂再次抽離，呈現出隱逸避世的心情。從不斷企求、依附到離魂、夢醒，日

40 在《史記·叔孫通列傳》記載：「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漢）司馬遷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頁2722。張達修以此典故比喻黃仲圖的耿介、不願阿諛奉承。

41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142。

42 類似張達修的心境，當時詩人展現出隱逸避世的遺民心境者，又如陳逢源〈二月二十八日事變有感〉所述：「江城昨夜起狂波，後果前因究幾多。人事難分棋黑白，黨碑長灑淚滂沱。已知老驥雄心死，其奈哀鴻滿眼何。稍喜劫餘身尚健，一春花信付磋跎。」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集》，頁54。

治時期以降的遺民意識在戰後動盪的變局中快速變化。而在張達修的詩作中，也出現許多隱逸詩作。如：

一夜山房睡未成，朝來佳氣挹黎明。溪山恍讀維摩畫，禽鳥如聞子晉笙。人入中年思養晦，我非處士欲逃名。仙源何日容棲隱，晞髮東阿百感生。⁴³

塵寰何處悟禪機，指點招提倚翠微。萬壘炎峰如畫本，一溪流水滌征衣。天留勝景供吟嘯，人入空門少是非。題罷新詩重下拜，梵王無語篆煙飛。⁴⁴

隱逸避世，是漢文化傳統中遺民表達自身意志的行為之一。正如余美玲在《日治時期台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一書中所論述的：「『遺民』諸多觀念的交疊雜錯、相互援引，一再見用於文人詩文中。尤其是對『遺』、『逸』之間的概念不易劃分清楚，經常是相互詮釋。」⁴⁵ 遺民的序章最早推到周代殷商之際，伯夷、叔齊以周武王攻滅殷商憤而「不食周粟」，隱居首陽山。⁴⁶ 從中就可看到遺民與隱逸避世之間的相互詮釋。而張達修詩作中「我非處士欲逃名」、「人入空門少是非」等語，實顯現張達修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對於時局已不再有過度的想像，只期盼有個可以隱居之地。

雖然張達修一心想隱逸避世，但還是無法擺脫高壓政治的迫害。1950年張達修獨子張振騰因被指控參加讀書會而遭逮捕、關押，後轉送綠島監禁12年，直到1962年5月16日才得以返家。張達修也因獨子遭受如此無妄之災，在詩作中表現他內心的感慨。在其〈四月十四日北上感作〉詩作即云：

分明无妄竟成災，文字懸知是禍胎。北望稻江頻灑淚，銀鐙有子未歸來。⁴⁷

43 張達修，〈八仙山曉起〉，《醉草園詩集》，頁143。

44 張達修，〈月眉山碧山寺留題〉，《醉草園詩集》，頁144。

45 余美玲，《日治時期台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01），頁6-7。

46 （漢）司馬遷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頁2123。

47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156。

根據張淵盛訪談張達修次女張翠梧所得知當時情狀，判定此詩應作於張振騰遭逮捕後二天，張達修前往台北探聽消息時所作。⁴⁸ 當時張振騰就讀台北行政專科學校（今台北大學前身），在民國39年（1950）4月12日遭到二名警總便衣從學校強行帶走。隔天家屬接到學校的通知，張達修在震驚之餘在14日到台北打探消息。在當時寫下的這首詩作中，張達修認為張振騰遭到逮捕乃是無妄之災，只是因為參加讀書會就因文字惹禍，內心充滿著悲痛與滿腹牢騷。這樣的心境也顯露在其〈無題〉一詩中，其詩云：

豺狼在後虎在前，苦鬥勞勞未息肩。地治已成差自慰，輿情關重是誰愆。
滿城風雨春猶新，一紙文章禍幾連。我似病瘡無可說，只憑忠義質諸天。⁴⁹

面對獨子遭關押，張達修的苦痛難以言說，而以「豺狼在後虎在前」來比喻當時政府縱容情治單位羅織罪名的苛政，以及貪圖高額獎金而構陷自己長子的情治人員。面對無端造成的文字災禍，滿腹委屈卻又不能明言。在詩末化用了屈原的〈天問〉末段所述「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⁵⁰之語，質問上天是否能用忠義等倫理價值打動政權高層？從張達修化用屈原〈天問〉的話語，也可見張達修將自己比擬為遭放逐後的屈原，對於原本堅持的倫理信仰開始崩潰、有所懷疑，進而向上天發出種種質疑。⁵¹

（二）新「遺民」社群的想像共構

在前面的描述中可知，傳襲自乙未割台、以漢文化為根基的遺民意識，在戰後初期經歷了短暫且旋即幻滅的「祖國」之夢。但是時代的更迭，張達修的生命歷程卻沒有就此中斷。雖然對於政局失望，進而衍生出隱逸的想法。但由於過去「漢

48 張達修著，張淵盛註解翻譯，《天涯猶有未歸兒：張達修漢詩白色恐怖悲歌》（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2014.06），頁33-34。

49 張達修，《醉草園詩文補集》（台中：張振騰，2010.03），頁6。

50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天工書局，1994.09），頁118。

51 關於張達修針對張振騰遭關押綠島期間之詩作，另可參見潘驥〈張達修文學的三種面向——現代性、異域經驗與創傷書寫〉、張淵盛〈走向國民：跨政權台灣末代傳統文人的應世之路——以張達修為主的考察〉與張達修著，張淵盛註解翻譯，《天涯猶有未歸兒：張達修漢詩白色恐怖悲歌》。

文化」遺民的身分認同，無法像過去一般將中華民國政府看成是異族統治的敵國。另一方面，在步入現代國家之後，國家控制的技術已不似王權時期。戰後威權時代的國家控制更是讓人隱無可隱、避無可避，更遑論明白顯示反抗政權的意圖。張達修的遺民意識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尚未完結的生命歷程中走下去？而在過程中又有何種變化？這或許可從1950年代的詩歌活動與書寫中，看到逐步受國家控制影響的過程。

1950年代以後，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統治較為穩固，在政治氛圍上著力於「去日本化，再中國化」。而隨著中華民國政府渡海來台的詩人已然在台灣落腳，在文學活動上也開始與台灣詩人有所互動。在互動的過程中也可能對彼此的歷史記憶與意識型態進行某些對話，在異中求同、或是為彼此置入不同的元素。正如王德威在《後遺民寫作》中提到的：

四九之後由大陸來台的人士儘管另起爐灶，終必與這一在地遺民話語展開對話。⁵²

雖然在王德威《後遺民寫作》中是以新文學為主要論述對象，但這樣的現象在戰後的古典詩壇也可以發現蛛絲馬跡。從「場域」(Field)的觀點來看，文學場域有別於政治場域，甚至有時還蘊含著對政治場域的反抗。欲改變文學場域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若直接以政治力量切入，所得到的或可能是虛應故事的書寫，甚而在書寫中蘊含反諷的意識，適得其反。因此，縱使在當時「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政治氛圍下，政權要進入台灣古典詩場域，並與日治時期以來具有遺民意識的古典詩人展開對話、試圖使其改變立場，還是得尋找更精細、更容易讓台灣古典詩人接受的角度切入。⁵³ 而這個切入點，就可在日治以降盛行於台灣的擊鉢吟詩人大會中看到，特別值得觀察的

52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頁47。

53 正如張頌聖在〈現代主義文學在台灣當代文學生產場域裡的位置〉一文中所說：「在布迪歐的分析架構裡，文化生產場域存在於一般權力場域(general field of power)之內，但是有它自己的運作規律。權力場域裡政治和經濟的力量只能依循一種折射關係對文學生產產生作用。」張誦聖，〈現代主義文學在台灣當代文學生產場域裡的位置〉，「現代主義與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政治大學中文系主辦，2001.06.02-03)。

是于右任、賈景德二人的運作。時任監察院長的于右任與後來接任考試院長的賈景德都熱衷於參與擊鉢吟詩人大會，甚而因其身分而獲邀致詞並擔任詞宗。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身分外于右任、賈景德在清領時期更曾考取功名，在文化身分上更為台灣詩人所接受。于右任（1879-1964）為光緒年間舉人⁵⁴，賈景德（1880-1960）更是光緒30年（1904）進士。⁵⁵而對於日治時期即在台灣的「後遺民」來說，二人的出現更如想像中的文化「祖國」重現眼前。

在政治身分與文化身分的雙重加持下，于右任、賈景德就很輕易地取得戰後台灣古典詩場域的發言權。而在二人主導下的詩人大會，對於台灣的遺民意識在包容之餘，更在其中置入了新的遺民元素。如1951年舉辦的「辛卯端午全國詩人大會」，在詩題上就別具用心，在會中以〈台灣是自由民主之燈塔〉、〈辛卯詩人節紀念鄭成功〉、〈辛卯詩人節懷沈斯庵〉等題目讓詩人可以不同體裁、韻腳進行創作。從詩刊編排例以出題詞宗列首來看，〈台灣是自由民主之燈塔〉應為于右任所出題目，〈辛卯詩人節紀念鄭成功〉則為賈景德所出、〈辛卯詩人節懷沈斯庵〉則為陳含光，皆為戰後渡海台來、具有黨政背景的古典詩人。更以〈角黍〉為題進行擊鉢競技，由左詞宗賈景德、右詞宗林熊祥進行評選，張達修在當時還獲得「右一」的佳績。⁵⁶張達修在當時參與詩會的作品也可見於《醉草園詩集》中，而以〈詩人節懷沈斯庵〉、〈角黍〉為題：

高吟相對自由天，插艾良辰憶昔賢。萬里扁舟荒島外，半生皂帽瘴江邊。文章草昧推初祖，邱壑棲遲擬浪仙。今日臺員成樂土，騷壇勝會紀年年。⁵⁷

風味依然帶楚湘，包金裹玉綴端陽。稜稜待佐黃龍酒，更向三閭弔國

54 相關生平可參見「維基百科」于右任（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E%E5%8F%B3%E4%BB%BB>，檢索日期：2014.12.01）。

55 相關生平可參見「維基百科」賈景德（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88%E6%99%AF%E5%BE%B7>，檢索日期：2014.12.01）。

56 張達修，〈角黍〉，《台灣詩壇》1卷2期（1951.07），頁18。

57 張達修，〈詩人節懷沈斯庵〉，《醉草園詩集》，頁161。

殤。⁵⁸

從這次詩人大會的題目擬定，不難看出出題者實肩負著政治任務：將台灣定義為自由民主的基地，並與台灣在地原有的遺民意識產生連結，而明鄭時期的遺民典故正好成為連結台灣後遺民與戰後渡台詩人重構新「遺民」社群的關鍵。因此在極具政治標示的〈台灣是自由民主之燈塔〉之後，緊接著連出〈辛卯詩人節紀念鄭成功〉、〈辛卯詩人節懷沈斯庵〉二個與明末遺民有關的題目。而張達修在〈詩人節懷沈斯庵〉詩作中，將來到海島台灣的沈光文與過去屈原去國懷鄉漫步江邊的形象疊合，同時也是將1940年在中國重慶訂立的「詩人節」與台灣明鄭遺老連結。而「今日台員成樂土」之語則暗示著台灣在今日，再次成為中國渡海來台人士的樂土，與沈光文當時面臨的情境相同。這也顯現在戰後的詩人大會的書寫中，除明鄭時期的典故外，更加入不同的遺民元素。又如在〈角黍〉詩中「稜稜待佐黃龍酒」之語，則是化用了南宋岳飛「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的典故，⁵⁹ 希望能直搗敵人首府、恢復故國。

由此可見在戰後初期的詩人大會書寫活動中，逐漸加入不同於台灣日治時期遺民的書寫面向。而這些歷史典故與明鄭時期事蹟的共同之處，就在於都是要恢復一個已然逝去的完整政權。又如在1953年的「癸巳詩人節自由中國詩人大會」的作品中，更可見張達修受其引導，在詩作中展現一個意圖恢復完整政權的遺民書寫。當時大會以〈癸巳詩人節感事〉為題進行擊鉢競技，由左詞宗賈景德、右詞宗林文訪⁶⁰ 進行評選，而張達修獲得「左一右八」的佳績。⁶¹ 其詩後來在《醉草園詩集》中改題名為〈端午感事〉，其詩云：

薪膽中興地，良辰感獨多。南來新歲月，北望舊山河。雪恥懷勾踐，

58 張達修，〈角黍〉，《醉草園詩集》，頁161-162。

59 《宋史·岳飛列傳》：「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眾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見（元）脫脫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台北：鼎文書局，1978），頁11390-11391。

60 即林熊祥，字文訪。

61 《台灣詩壇》5卷1期（1953.07.01），頁24。該期為「癸巳詩人節自由中國詩人大會特刊」。

投詩寄汨羅。江千風雨霽，簫鼓起靈鼉。⁶²

在詩作中，台灣成了體現屈原去國懷憂、勾踐臥薪嘗膽復國的地方，是南渡文人北望故國而企圖復興之所。雖未知張達修在典故的運用上是有意還是巧合，但張達修在〈端午感事〉一詩被左詞宗賈景德評為首選，實有示範的作用，向台灣古典詩人展示若欲獲獎則詩作必須帶有「反攻」大陸的成分。在于右任、賈景德主導下的詩人大會中，台灣詩人的遺民意識在巧妙的運作下，逐漸被導向「反攻」大陸的面向。

從詩人大會的命題、創作、評選的過程來看，戰後渡海來台人士與台灣「後遺民」間的對話已有實際上的成果，在張達修詩作中開始出現不同於日治時期的「遺民」書寫面向。從原本以漢文化為祖國的籠統想像，逐漸聚焦到恢復一個完整國度的反攻政策上。

到了1954年的詩人大會，更是直接以應酬意味極高的〈甲午詩人節大會歡迎越南大詩家阮文心先生〉為題進行擊鉢競技。阮文心（1893-1990）為越南人，曾於1952年6月到1953年12月，擔任阮朝末代皇帝保大帝之越南國首相。⁶³但為何卸任的阮文心會來到台灣？在當時賈景德寫下〈甲午詩人節賦簡大會諸詩友〉之作，在其詩前有序即交代阮文心到訪的原由，其文云：

感甲午之重逢，割台之恨既消，在莒之治彌厲。又值紅河戰事方急，鎮海會議待開。越前總理阮文心先生來台訪問，小作盤桓，以南國之詞宗，參詩人之盛會。撫時傷事，心感同深。⁶⁴

阮文心來台時，正值法越「奠邊府戰役」末期，法軍大敗，其後九國（柬埔寨、北越、法國、寮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南越、蘇聯、英國和美國）於日內瓦談判法國退出中南半島與分割越南為北越與南越等事宜。他來台訪問，應肩

62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181。

63 相關生平可參見「維基百科」阮文心（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AE%E6%96%87%E5%BF%83>，檢索日期：2014.12.01）。

64 賈景德，〈甲午詩人節賦簡大會諸詩友〉，《台灣詩壇》7卷1期（1954.07），頁2。

負南北越政局穩定的任務，而前來與中華民國政府高層商討後續合作事宜。正值詩人大會舉辦，故安排他參加這次活動。⁶⁵而當時賈景德寫下的〈甲午詩人節賦簡大會諸詩友〉，⁶⁶也巧妙的將台灣「遺民」深感遺憾的割台事件，與當時中華民國政府亟欲反攻大陸的政策，以及同樣面臨分裂而尋求以戰爭統一的韓、越等國際情勢相結合。此外，賈景德更以當時所作詩二首，廣邀全台詩人和作。而在張達修現存詩作中，也可見當時唱和賈景德之作，當中或有揣摩賈景德之心意而作的成分。其詩云：

鼓吹中興致太平，十年薪膽勵忠貞。馬關雪恥三台復，鯤海浮家一葉輕。亂世真才勤賞識，危時曲學漫爭鳴。過秦論與哀湘賦，憂國長沙共此情。⁶⁷

縱橫島嶼繞澎台，隱隱濤聲入耳哀。江海雄師懷壯肅，風騷初祖溯文開。洗兵待挽銀河水，投老誰憐玉局才。極目神州三萬里，饒歌何日奏歸來。⁶⁸

張達修不只以賈景德原詩的韻腳，同時在內容上也呼應其原作，將台灣過去的歷史投射在當時反攻大陸的時代情境中。彷彿戰後台灣的「光復」、清領時期劉銘傳的自強新政、或是沈光文來台成為開拓漢文化的先驅，這些台灣歷史都是為了今日的反攻而存在。更以漢代的賈誼來比擬賈景德，歌頌其憂國之情。

至於在當年的詩人大會方面，〈甲午詩人節大會歡迎越南大詩家阮文心先生〉由左詞宗賈景德、右詞宗張昭芹進行最後評選，在此次大會張達修也獲得「右花左六」的佳績。⁶⁹而在《醉草園詩集》中〈詩人節歡迎越南阮文心先生〉一詩就

65 越南舊王朝士人因與中國長期互動，也能創作古典詩文。賈景德有〈越南戰事感懷次河內阮鼎南原韻四首〉之作，為唱和阮文心原韻者，可知阮文心亦能詩。見《台灣詩壇》7卷2期（1954.08），頁2。

66 賈景德〈甲午詩人節賦簡大會諸詩友〉原作云：令節年年弔屈原，詩人報國重廉貞。興觀深處心神奮，忠愛真時去就輕。麗日中天仍普照，元音盛世有和鳴。據鞍擊楫無能役，在莒難忘此際情。（其一）六十年前痛割台，馬關回首有餘哀。歲周甲午巖疆復，詩紀庚寅韻事開。韓越未停爭地戰，敦槃難得濟時才。富良江畔烽煙緊，卻喜詞人遠道來。（其二）

67 張達修，〈奉和煜公甲午詩人節韻〉，《醉草園詩集續編》，頁229。

68 張達修，〈詩人節煜公有詩次韻郢政〉，《醉草園詩集》，頁192。

69 同註64，頁24。該期為「甲午詩人節自由中國詩人大會特刊」。

是當時的作品，其詩云：

萬里人來古越裳，敦槃勝會紀端陽。馬關雪恥巖疆復，鯤島昌詩意氣昂。
蘭芷未銷湘客恨，衣冠喜接令公香。婆娑海匯鄱河水，唇齒相期固國防。⁷⁰

在詩作中可見，張達修的書寫不再局限於「中國—台灣」之間的連結，更是將自身的遺民經驗與當時「北越—南越」、「北韓—南韓」的國際情勢相結合，而以南方政權為正宗，也都有意欲北伐以恢復故國的南渡「遺民」。而張達修期待這次詩會能讓南越與當時在台灣中華民國政府之邦誼更加穩固、互為唇齒。而張達修在詩中也以台灣過去曾因馬關係約割讓，讓台灣民眾成為漢文化遺民的經歷，來暗示著失去的領土終將收復，最終在詩作中也形成在冷戰架構下「自由／共產」陣營的對抗想像。

除了在詩題與書寫活動中涉入國家控制的成分，將書寫的面向逐漸導向配合國策的書寫之外，從詩人大會名稱的變革也可看到將台灣「遺民」意識導向冷戰架構的傾向。從1951年的「辛卯端午全國詩人大會」到1953年「癸巳詩人節自由中國詩人大會」、1954年「甲午詩人節自由中國詩人大會」，將籠統的「全國」置換成政治標誌更加顯著的「自由中國」。將台灣詩人納入「自由中國」之中，將之導向冷戰框架下的民主陣營。另一方面則是置入對岸是「共產中國」的印象，創造出兩岸對立的情勢。這種情勢的塑造正與明鄭與滿清對峙的歷史相似，而有如此舉措或有將台灣的「遺民」意識帶到更高的國際架構的意味，一個高於國共內戰的冷戰架構，形成戰後初期特殊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四、結語

縱而觀之，張達修的例子實是跨越日治與戰後時期台灣詩人的心靈縮影。承襲自乙未割台以來，透過父祖、師友及「地方」場域中流佈的傳說，進而傳遞的遺民意識。而張達修在其成長過程即以漢文化的遺民自居，表現在書寫中就展現出在

70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頁192。

異族統治下不斷追尋和文化的遺跡，並召喚當中屬於漢文化的倫理價值。這也讓張達修未經歷乙未割台，卻有著「遺民」意識，成為王德威筆下所謂的「後遺民」。這種以漢文化為根基的「遺民（後遺民）」想像，在戰後找到情感上的出口，追尋文化「祖國」的欲求寄託在戰勝國之一的中華民國政權。就如同替「遺民」的幽魂找到一個可附身的政治實體，以擺脫「遺民」的身分，重獲新生。

但日治時期以降的遺民意識在戰後動盪的變局中快速變化。面對日本戰敗投降後，接踵而來的二二八事變、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等時代變局，甚而後來的白色恐怖讓張達修成為受害者家屬。此時張達修心中遺民的幽魂再次抽離，呈現出隱逸避世的心情。從不斷企求、依附到離魂、夢醒，就發生在短短的戰後數年間。

張達修雖一度想隱居避世，但現代國家控制的影響卻讓其無法逃避。在文學場域方面，透過張達修可以看到戰後詩人大會中，受到政治的影響。知名詩人如于右任、賈景德運用在政治、文化上的雙重身分，掌握戰後初期的台灣古典詩壇活動。透過命題、評選、唱和等方式，逐漸將反攻國策置入台灣的遺民意識之中。而台灣的遺民意識在戰後也與渡海來台的詩人產生對話，在張達修詩作中開始出現不同於日治時期的「遺民」書寫面向。從原本以漢文化為祖國的籠統想像，逐漸聚焦到恢復一個完整國度的反攻政策，更進一步被帶到冷戰架構。這種以漢文化祖國的遺民意識，逐漸被帶到反攻復國的遺民想像，當中的轉折成為台灣古典文學史上相當特殊的歷史關鍵，也展現了台灣戰後初期古典詩書寫的特殊之處。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元)脫脫等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台北：鼎文書局，1978)。
-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天工書局，1994.09)。
-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09)。
- (漢)司馬遷，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78)。
-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11)。
- 余美玲，《日治時期台灣遺民詩的多重視野》(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01)。
- 李筱峰，《林茂生·陳忻和他們的時代》(台北：玉山社，2004.06)。
- 屈萬里，《尚書釋義》(台北：中國文化學院，1980)。
-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台北：聯經出版社，2009.03)。
- 張達修，《醉草園詩文補集》(台中：張振騰，2010.03)。
- ，《醉草園詩集》(台中：張振騰，2007.05)。
- ，《醉草園詩集續編》(台中：張振騰，2008.12)。
- 張達修著，張淵盛註解翻譯，《天涯猶有未歸兒：張達修漢詩白色恐怖悲歌》(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2014.06)。
- 陳逢源，《溪山煙雨樓詩存》(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3)。
- 葉榮鐘，《少奇吟草》(台中：晨星文化出版社，2000.12)。
- 廖振富，《台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07)。
- 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中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09)。
- 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弘志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03)。

二、論文

(一) 期刊論文

- 林翠鳳，〈張達修的醉草園描寫〉，《人文社會學報》4期(2005.12)，頁65-85。
- 張達修，〈秋望〉，《詩報》27期(1932.01.01)，頁24。

- ，〈新高暮春書事〉，《詩報》39期（1932.07.15），頁13。
- ，〈角黍〉，《台灣詩壇》1卷2期（1951.07），頁18。
- ，〈癸巳詩人節感事〉，《台灣詩壇》5卷1期（1953.07），頁24。
- 賈景德，〈甲午詩人節賦簡大會諸詩友〉，《台灣詩壇》7卷1期（1954.07），頁2。
- ，〈越南戰事感懷次河內阮鼎南原韻四首〉，《台灣詩壇》7卷2期（1954.08），頁2。

（二）學位論文

- 張淵盛，〈走向國民：跨政權台灣末代傳統文人的應世之路——以張達修為主的考察〉（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
- 張滿花，〈張達修及其詩研究——以《醉草園詩集》為例〉（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 潘驥，〈張達修文學的三種面向——現代性、異域經驗與創傷書寫〉（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三）研討會論文

- 江寶釵，〈生事歸清恬——論張達修詩中的身／生命觀〉，「張達修暨其同時代漢詩人學術研討會」論文（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05.06.25）。
- 李知灝，〈殖民母國／文化母國：張達修日治時期遊日、中書寫的遺民心境〉，「2014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海峽兩岸東亞沿海地區與島嶼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台灣海洋大學主辦，2014.10.23）。
- 林文龍，〈張達修先生的漢詩師承〉，「張達修暨其同時代漢詩人學術研討會」論文（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05.06.25）。
- 張淵盛，〈張達修《醉草園詩集》中的大陸經驗研究〉，「張達修暨其同時代漢詩人學術研討會」論文（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05.06.25）。
- 張誦聖，〈現代主義文學在台灣當代文學生產場域裡的位置〉，「現代主義與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政治大學中文系主辦，2001.06.2-3）。

三、網路資料

- 「台灣古典文學家張達修手稿數位典藏計畫」（來源：<http://140.128.27.43/showtest/index.php>）。

「智慧型全台詩知識庫」王則修（來源：<http://xdcn.nmtl.gov.tw/twp/TWPAPP/ShowAuthorInfo.aspx?AID=1025>）。

「維基百科」于右任（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E%E5%8F%B3%E4%BB%BB>）。

「維基百科」阮文心（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AE%E6%96%87%E5%BF%83>）。

「維基百科」黃仲圖（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4%BB%B2%E5%9C%96>）。

「維基百科」賈景德（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88%E6%99%AF%E5%BE%B7>）。

